

文化交涉与东亚世界的书院

吾妻重二*

序 言

“文化”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有很多种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文化”是通过与其他地域的相互交流而产生、展开的。例如，我们常常说“欧洲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等，而所谓“欧洲文化”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与非欧洲世界起源的基督教、伊斯兰地域等有漫长的历史交流而成立的。“中国文化”或“日本文化”也是如此，在过去也通过与印度、欧洲、美国等各地文化的接触而成立，今后，这种交流也会继续开展进行下去。

特别是东亚地域之间的相互距离很近，文化的交流涉及很多方面，到现代也在多种领域中有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交涉。可以说，文化是超越国界而展开的。

在此，笔者拟根据这种“文化交涉”的观点，对书院文化与近世中国、东亚世界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以供参考。

一 文化的交流与书院

（一）近世东亚世界的民间学校

在东亚世界，书院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东亚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因为在近世东亚世界文化中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儒教、特别是朱子学的广泛传播，与此相应，在东亚各国成立了很多民间学校——书院，可以说此是这个时期构成东亚文化之特征的重要指标。

所谓“书院”，如字面解释那样，原来是收藏“书”的建筑，也就是图书馆之类，后来产生了士人读书之别邸的意思，但从十世纪即中国宋代以后，书院的意思就转变成“民间的学校”，诸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这些大规模书院都聚集了很多学生；到南宋时期，众所周知，书院在中国各地兴建起来¹⁾。伴随着士人（即知识精英）的活动以及出版技术的发达，民间讲学得到迅

*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关西大学 ICIS 事业推进担当者 关西大学文学部長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 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长

1) 关于中国的书院研究有很多，可以参看：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华世出版社，1934年），陈元晖·尹德

速的发展,使得以儒学为中心的知识世界变得十分活跃。

当然,当时官立学校也相当发达,首都的太学以及中国各地的“州县学”相继成立,很多学生在这种学校学习,但是这些官立学校主要是应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除了某段时期之外,作为讲学机关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在宋代以后,作为讲学和教育场所的私立学校、书院相对于官立学校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仅如此,具有时代之代表性的思想家,诸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王守仁、湛若水、清代考证学者们所依托的学问所,基本上都是书院²⁾。可见,宋代以后,书院成为中国知识活动的中心。

不过,书院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民间学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近世的东亚国家中也都盛行这一事实。这里所说的“近世”,相当于中国的宋代(十世纪以后)、朝鲜王朝后期(十七世纪以后)、越南黎朝(十五世纪以后)、以及日本的江户时代(十七世纪以后),对这种各地状况,笔者曾做过概述³⁾。

那么,近世东亚世界的书院情况又如何呢?

(二) 书院、私塾的发达

1) 日本

首先看看日本民间学校的情况。在日本,民间学校一般称为“私塾”。日本私塾开设的数量,在江户时代初期(17世纪)很少,到宽政年间(1789-1800年)开始增多,经过文化、文政年间(1804-1830)以至幕末的十九世纪前叶,其数量急剧增加。江户时代开设的私塾数量很难精确把握,单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的记录来看,就有一千三百所⁴⁾,实际上全国应该能达到数千之多⁵⁾。官立的“藩校”以及初等教育场所的“手习所”在全国急剧增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因此,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儒学之大众化”⁶⁾、“教育爆发”的时代⁷⁾。在这个时代,从大都市到地方的小都市,从支配阶层的武士到商人、富农的庶民阶层都广泛地受到教育,庶民出身而学习汉学,参与幕府政治的人材也有很多。

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亚文明研究丛书30,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遗产》(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 书院的普及是近世中国或近世东亚文化重要指标的(民间学校),关于这点,笔者曾在汤浅邦弘编《概说中国思想史》(ミネルヴァ书房,2010年)第五章“宋代”中做过说明。其他的指标,可以列举出以下五点:①科举制度的完备与文人官僚的活跃、②新兴士大夫阶层的兴起、③商业的发达、④新书面语(古文)的成立、⑤印刷与情报革命。

3) 近世东亚世界中书院的意义,可以参看:拙稿“东アジアの书院について——研究の視点と展望”(《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2《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书院研究》,关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8年)。

4) 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思文阁出版,1983年)第17页。

5) 石川松太郎“私塾”(《国史大辞典》第6册,吉川弘文馆,1985年)第772页。

6) 宫城公子《幕末期の思想と習俗》(ペリかん社,2004年)第一章“幕末儒学史の視点”。

7) 市川宽明·石山秀和《图说 江戸の学び》(河出书房新社,2006年)。

2) 中国

在中国，书院多在明清时代建成。据邓洪波的调查，明代的书院有1962所，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此前的唐、五代、宋、辽、金、元朝代建成的书院总数的两倍之多。以后，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增加，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顶峰，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迎来第二个高峰⁸⁾。之后，清代又是书院空前繁盛的时代，其数总计达有4365所。在数量上最多的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其次是康熙年间（1662-1722年）和光绪年间（1875-1908年）⁹⁾。

3) 朝鲜

朝鲜的书院，以中宗三十六年（1543年）建成的白云洞书院为嚆矢，以后陆续增加，在朝鲜王朝后期，特别是1690年前后开设的数量最多。高宗的隆熙二年（1908年）刊行的《增补文献备考》中记录的书院有378所，这只是政府所掌握的数据，实际上如果包括奉祀先贤的祠宇书院，则能达到千所以上¹⁰⁾。

4) 越南

关于越南的民间学校如何，有很多不明之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十五世纪以后，由于科举制度之整備，民间学校也相继设立，特别是阮朝的十九世纪以后，民间学校在都市及农村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普及¹¹⁾。

如此，日本、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之间民间学校的盛行时期有所错开，可以说主要是以中国为信号源而波状地扩大。

话题回到日本，日本的民间学校有何种意义及特色？以下即以日本的私塾为中心，通过文化交涉的观点与其他东亚地区相比较来进行考察。

二 东亚的情况

私塾在江户时代几乎遍布全国。所谓“私塾”，简而言之，是私人所设立的小型学问所，在日本，其定位大概处于以武士为对象的昌平坂学问所、藩校等“官学”与进行初等教育的卑微“手习所”（寺子屋）的中间。

“书院”这个称呼在日本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日本教育史资料》中有丰富的江户时代有关资料，调查江户市中私塾名称的海原彻说：

《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中所收录的123所学校，除去不明的33所，其他的90所学校中，

8) 注释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341页，第350~351页。

9)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532页，第541页。

10) 以上，参看：최완기《한국의 서원(韩国的书院)》(대원사, 1991年)第19~20页，第40页。

11) 嶋尾稔“ベトナムにおける伝統的私塾に関する研究のための予備的報告”(注释3《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2“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书院研究”)，DINH Knac Thuan“ベトナム教育史概説”(二ノ宮聡译，《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3号，关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据点，2010年)。

最多的称呼是“塾”以及与此类似的，总共有30所（“塾”23个、“义塾”3所、“家塾”2所、“学塾”1所、“私塾”1所），以下是“堂”22所，“舍”20所（“学舍”10所，“舍”9所，“精舍”1所），“学校”4所，“社”3所，“楼”2所，“教授所”1所，“所”1所，“齋”1所，“轩”1所，“书院”1所，“馆”1所，“亭”1所，“道场”1所，“斋”1所¹²⁾。

可见，最多的称呼是“塾”，其次是“堂”和“舍”。这虽然只是江户市内的情况，但全国大致也应是如此。以“书院”命名的私塾，比较著名的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的“藤树书院”、藤泽东咳（1794-1864年）的“泊园书院”，池田草庵（1813-1878年）的“青谿书院”，这些只是少数，而且“泊园书院”原来叫“泊园塾”¹³⁾；大阪的“怀德堂”，中井竹山有时也称为“怀德书院”，但毕竟没有成为通称¹⁴⁾。关于为什么日本不太使用“书院”的称呼，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是以下两点因素值得考虑：第一，有必要与“书院造”或者表示大名（诸侯）房屋的客间“书院”有所区别；第二，日本的私塾与中国、朝鲜王朝的书院不同、私人的性格很强，而且一般规模都很小¹⁵⁾。

在中国也有“私塾”的说法，但指的是初学者教育的场所。最近，刘晓东将私塾界定为“由私人或私人集团主持的较低级别的、以‘养正启蒙’为主旨的基础教育活动及其组织形式”，而且把明代普及各地的私塾划分为“社学”、“义学”和“家塾”三类¹⁶⁾。不用说，中国的书院是以士人为中心的高层次学问研究、讲学的场所。朝鲜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士人负责在书院进行讲学，而初等教育则在“书堂”中进行。

在越南，“书院 THƯ VIỆN”之词一般是指收藏书籍的图书馆，而民间的学校多被称为“乡学”或“LỚP ÔNG ĐỒ”，意思是“教汉文的老师的教室”。在越南，负责高层次讲学的民间学问所不太发达，最常见的形态是学生亲自到老师家里去接受汉字、汉文等初级教育。有意思的是，越南语中“书院 THƯ VIỆN”是指“图书馆”，却保存了中国“书院”的原意¹⁷⁾。

这样，同样是民间的学校，按水平的高低中国则分为“书院”和“私塾”，朝鲜则有“书院”和“书堂”，书院与私塾、书堂之间都有比较明确的区分。但是，在日本则不是这样，不论称为“塾”或“书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可以用“私塾”来概括之。总而言之，相当于中国的“私塾”、朝鲜的“书堂”、越南的“乡学”、“LỚP ÔNG ĐỒ”的初等教育机关，在日本则是“手习所”（寺子屋）。以上，可以整理为表1。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私塾在中国或朝鲜是指初等教育的学校，而在日本则未必如此。在日

12) 注释4的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第7页。

13) 吾妻重二编著《泊园书院历史资料集——泊园书院资料集成1》（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丛刊29-1、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第232、240页。

14) 汤浅邦弘“书院としての懷德堂”（大阪大学出版会，注释2《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2所収）。

15) 关于规模，中国、朝鲜的书院大约相称于日本的藩校。

16) 刘晓东《明代的塾師与基层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9页。

17) 注释11嶋尾论文，以及DINH Knac Thuan《ベトナム教育史概説》第106页。

本，不管规模如何，私塾是包含了相当于中国、朝鲜之书院的高层次讲学组织。

表 1 东亚民间的讲学机关

	日 本	中 国	朝 鲜	越 南
讲学·研究 (高层次)	私塾	书院	书院 (서원)	不发达
初等教育 (低层次)	手习所 (寺子屋)	私塾	书堂 (서당)	LỚP ÔNG ĐỒ (汉文教室)

三 日本私塾的特点

(一) 私人性格

下面进一步探讨日本私塾的特色¹⁸⁾。日本的私塾基本上以中国书院为范本¹⁹⁾，作为与官立学校相抗衡的民间学校发展起来，但私人性格却很强。江户时代的儒者三轮执斋说：

士庶之好学者，其德足以服人者，又皆私建学舍，劝诱其徒²⁰⁾。

辛岛盐井也认为，私塾的发展与学政或政府文教政策没有特别的关系：

浪人儒者等各立私塾，以育门人，其专凭己之所好，擅自活动²¹⁾。

此说明很重要，私塾是学德优秀之人各自建立的，不受政府当局之管辖，不问“士庶”、即不问武士或庶民的阶级，都可以建立私塾。当时，官立教育机关有昌平坂学问所以及各地的藩校，这些学校都是以当局的方针为准，专门教育武士阶级，而与此相反，私塾是完全基于自由裁量而经营的，而且教育对象不问武士与庶民。

(二) 与政府当局的关系

如此，私塾的私人性格还意味着与政府（幕藩当局）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关联。关于这点，日本的私塾与中国、朝鲜的书院有同也有异。中国、朝鲜的书院原来也是为了学者自己传授学艺而

18) 以下的论述主要依据注释4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序章。

19) 吾妻重二“江戸初期における学塾の発展と中国・朝鮮——藤原惺窩、姜沆、松永尺五、堀杏庵、林罗山、林鷲峰らをめぐる”（《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2号，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9年）。

20) 三轮执斋“执斋先生杂著”卷二，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彙编》第二卷（东京·金尾文渊堂，1911年）第491页。

21) 辛岛盐井“学政或问”，《日本教育史资料》（文部省，1890~1892年）第八册，第1页。

建立的，但是在南宋以后，中国的书院开始受到朝廷的庇护及管制。得到朝廷颁发的额或图书的书院也增多，因此逐渐“官学化”了。中国和朝鲜的“赐额书院”有很多，由此而得到格外的尊重，这是众所周知的²²⁾。但是，在日本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赐额书院”，得到幕府的官方许可或庇护的私塾，只有林罗山开创的林家家塾（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和大阪的怀德堂等几所而已²³⁾。

换句话说，幕府政府当局对于私塾并不关心，一直采取了放任、默认的态度。除了幕末时期，几乎没有由当局强制关闭私塾，其原因也在这里。

（三）私塾的存续期间

敬慕学者个人的学德而聚集起来的学生，由此自然就产生了私塾，因此，塾主去世后大部分私塾也就会关闭。海原彻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主持私塾的人大多是老师本人，这也是因为私塾本来就是以仰慕特定个人品格及学问而集中起来的学生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缘故。很多私塾也因此仅存创设者一代后就关闭。确实，例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塾主通过若干次世代更替，持续了两百年以上的私塾也不是没有，但是私塾之作为私塾的特点之一毋宁说就在于短时期内会消失²⁴⁾。

除了海原彻所举的古义堂之外，还有持续140年的怀德堂、有92年历史的广濑淡窗创立的咸宜园、延续120年之久的泊园书院等私塾，但这些都是特例，大多数私塾的经营都限于创始人一代。

可是在中国，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持续千年或数百年的书院并不少，得到复兴重建而持续很久的书院也很多。这可能与政府、官僚的保护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在朝鲜，奉祀名贤的书院由其子孙管理运营，朝鲜王朝后期有很多“门中书院”持续了很长时期。由一族经营书院的情况可以说是朝鲜书院的特点，这种形态在日本私塾中很难找到。

（四）祭祀机能

中国、朝鲜的书院都有祭祀先贤的机能。祭祀的对象是孔子以及学派、书院的创始人，其目的是为了学派之持续或宗族之维持，重点在于保持“学统”或“血统”。日本的私塾，诸如古义

22) 关于朝鲜的书院，可以参看：梅根悟监修《朝鲜教育史》（世界教育史大系5，讲谈社，1975年），丁淳睦《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79年），注释11 최완기 《한국의 서원》（韩国的书院）、郑万祚《朝鲜时代书院研究》（集文堂、1997年），李树焕《朝鲜后期书院研究》（一潮阁，2001年）。关于韩国书院研究的文献目录，薛锡圭“韩国书院研究目录”（注释3《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2“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书院研究”所收）论述甚详。另外，赐额书院的例子在中国也有很多。

23) 林家家塾在宽永七年（1630年）由将军家光赏赐私塾场地，宽永九年（1632年）得到尾张藩主德川义直的“先圣殿”之额等等，得到了将军家的厚待。怀德堂则在享保十一年（1726年），由三轮执斋的斡旋而得到幕府的官方认可。

24) 注释4 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第29页。

堂、怀德堂和泊园书院确实也祭祀孔子，但是没有祭祀私塾创始人的例子，这意味着日本的私塾一般不具有庙（祠宇）的功能。

（五）私塾与财政

日本私塾经营费用的来源是学生上交的束脩或谢仪。束脩是指入学金，谢仪则相当于上课费。另外，私塾的学舍大多数是教师个人的住宅，“不仅是建设费，维持的费用也由教师来承担是很普遍的情况，当然也有由私塾学生承担一部分的场合”²⁵⁾。换句话说，在中国、朝鲜所能看到的用学田、书院田的收获来维系经营的情形在日本很少，日本的情况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依据学费的独立核算制。这大概与日本的私塾是以教师和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成立的私人性格组织有关。

（六）私塾与政治活动

日本的私塾很少与政治活动之推进相关。当然，在幕末的社会激荡时期也有一些特例，诸如大盐中斋的洗心洞、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天诛组的双松冈塾²⁶⁾、大桥讷庵的思诚塾等²⁷⁾，这些私塾政治结社的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江户时代的整体来看这样的私塾还是极少的。

与此相反，在中国和朝鲜，书院屡屡成为政治活动的据点。明代后期在王守仁、湛若水等人影响之下成立的书院、明末的东林书院都是如此，这些书院由此而触怒政府当局，遭到避讳甚至成为镇压的对象。不仅如此，在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的上谕中，对各地的书院有如下布告：

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²⁸⁾。

这个上谕的意图在于要除去民间书院批判政府的幼苗，这也说明，书院成为政治言论之场所的可能性很高。

在朝鲜，称为“士林”的知识分子结集在野势力，以书院作为政治运动据点与王朝权力勇敢地进行对抗活动。这样的行动触怒了王朝，结果在1871年，高宗的父亲兴宣大院君关闭了很多书院。

25) 注释4 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第42页。

26) 关于双松冈塾，可参看梅溪升编著《大阪府の教育史》（思文阁出版，1998年）第222～225页。

27) 关于大桥讷庵，可参看注释6 宫城公子《幕末期の思想と習俗》第二章“「誠意」のゆくえ——大桥讷庵と幕末儒学”。

2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

(七) 多样化的私塾

在日本私塾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教授中国古典的“汉学塾”，不过，到江户时代后期，教授日本传统学艺的“国学塾”在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之后，以“兰学塾”为中心的“洋学塾”也成立，到幕末时期教授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语言和学问的私塾相继登场了²⁹⁾。在中国，到清末时期，新式的书院的建成并不多，在朝鲜的书院则直到20世纪初期，几乎都以朱子学为宗旨。可以说，日本私塾的这种多样性是中国和朝鲜所没有的一个特色。

结 语

本文考察东亚的书院、私塾，并且用文化交涉的观点对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做了比较研究。日本的书院、私塾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多样性。

不过，要追根溯源，其成立还是来源于中国。在后世，中国、韩国的书院作为官学的色彩愈加浓厚，可是，像朱熹和陆九渊这样、倾注热情而展开的民间讲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朱熹等人为首的民间学校“书院”在近世东亚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笔者希望以后还能更进一步地研究儒学、朱子学的广泛作用及其意义。

29) 海原彻《学校》(日本史小百科, 东京堂出版, 1996年)的“私塾”项。